

中国现当代文学

山东大学名牌建设课程教材
黄万华◎著

中国现当代文学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CHINA

第①卷（五四—1960年代）

这本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的特色在于，它力图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原本就贯通的历史血脉，探讨完成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文学历史整合的具体途径。强调在人生的感受和文学的感觉结合中的作品阅读。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中国
现
当
代
文
学

当代文学

ISBN 7-5329-2536-6/I · 2032

定价：27.00元

责任编辑/马兵 王月峰 封面设计/洪菠

ISBN 7-5329-2536-6



9 787532 925360 >

中国当代文学

第①卷（五四—1960年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黄万华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3

ISBN 7-5329-2536-6

I. 中… II. 黄…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②当代文学—文学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06456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90 × 1240 毫米 1/32 印张/17.25 插页/2 千字/454
印 数	1—3000
定 价	27.00 元

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念(代前言)

- 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 ○“天、地、人”的文学史意识
- 现代文学史的分期 ○现代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和典律构建
- 人生的感受和文学的感觉的结合

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前后产生的，用现代的文学语言和形式表达现代中国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富有学术活力的学科。

面对中国现代文学，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念？

一、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

“没有谁是个独立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土，整体的一部分。大海如把一个土块冲走，欧洲就小了一块，就像海峡缺了一块，就像你朋友或你自己的田庄缺了一块一样。每个人的死都等于减去我的一部分。因为我是包括在人类之中。因此不必派人打听丧钟为谁而敲，它是为你敲的。”这是16世纪末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做教士时的一段著名布道，其中包含的生命整体意识正是我们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立足点。

中国现代文学是从古典性、一统性过渡到现代性、分合性的文学形态。由于对于现代性、分合性认识的偏差，我们常常会将许多文学存在逐出我们的文学史视野。

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的现代性是一种充满历史性悖论的过程，这种历史性悖论实际上是历史的多元共生，反映出“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与对现代性的‘批判’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例如，

“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艺术追求构建了文学的现代性视野，随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集团艺术”同样体现了现代性的追求；文学的实验性、精致化，乃至“贵族”化体现了现代性，文学的世俗化、通俗化也可运行于现代性轨道……它们都从不同方面体现了中国人的心灵变动这一中心课题。从这中心课题出发，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种种悖论，如其世界性背景中包含的西化主导跟民族化需求构成的悖论，作家良知追求中包含的感时忧国跟文学自身品格构成的悖论，乃至乡土情怀中包含的本土意识跟民族文化的统一性构成的悖论等，都是悖反中的共生，悖论双方孤立起来都不免有所局限，于是发生冲突，合则成其大，成为不可分割的文学生命。

中国现代文学的分合性，不仅是指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走的就是多源多流、交错嬗变的路，以后形成着多种传统（例如有的论者就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左翼文学传统、坚守艺术本分的传统、现代主义都市文学传统、鸳鸯通俗文学传统等），也指不同政治文化空间（例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中的文学既血脉相通，又各有流变，呈现出中国文学的生命整体形态。然而，过去褊狭的文学史观念往往分割着这种文学生命整体性，以放逐某种文学而造成着文学史的严重残缺（例如，在全世界华人世界有较大影响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中国大陆以外的作品占了47部，这些作品至今还有不少被摒斥于文学史构建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中国小说50强（1978—2000）》一类“经典”书单也常常出现台港澳文学的集体“缺席”）。

作家心灵视野的广阔、文学情理世界的宽容，都在告诉我们文学是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作为以情感性想象展示生命之美的艺术思维，不同于以逻辑推理揭示事物之真的科学思维，不同于以价值尺度追求人类之善的伦理思维，也不同于以偶像崇拜求得灵魂之安的宗教思维，文学正是从其自身的这一本质存在出发呈现出其生命整体感。治文学史者难免有自己的倾向、情感、偏好，但如果因此而排斥了任何一种文学，那么恰恰

是对自己文学生命的致命伤害；治文学史者也往往从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出发，但延续生命的就不只是这片土地，还有更广大的空间。

二、“天、地、人”的文学史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性已浮出历史地表，但对包括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完成学术整合，还存在许多难题，尤其是文学差异带来的历史整合的困难。

著名旅美散文家王鼎钧曾用“一山一水一圣人”“千山千水千才子”形容中国南北散文的差异，这引导我们回到“天、地、人”这一古朴而宏大的历史语境中。美国加州大学杜国清教授也曾提出以“天、地、人”三个要素呈现的“文化传统”“本土精神”“外来影响”作为描述和评价文学史的三个基本侧面。而我们觉得，“天、地、人”观念具有的多层次性，最足以容纳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呈现其生命的整体性，也能突破中国内地、台港澳地区社会历史转型和现实体制的差异而给文学史整合带来的难题。

在我们的文学史观念中，“天”主要指文学现象的时间性，悠久的历史积淀与革故鼎新的时代因素的交互作用将主要在这一维度上展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跟“五四”后文学千姿百态的历史现实形态构成复杂纠结的关系，呈现出中华民族文学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激烈变动中的生命机制。

“地”主要指文学现象的地域性，文化的本土情怀与外来影响的激烈撞击，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地域文化的乡土情怀间的互动关系，现代文学多地区多中心多传统格局的形成和演变等，都将在这一维度上展开。而在民族文学日益被拖入世界性视阈的语境中，上述内容都呈现出复杂纠结，是需要小心谨慎对待的。

“人”包括审美主体（作者、编者与读者）和作品人物，“人”可以顶天立地，却无法突破“天”“地”。20世纪中国作家

命运始终深深牵制在历史和时代、民族和世界、作家良知和作品意识的复杂关系中，其笔下人物也无法脱却这些印痕。其中最深重的印痕恐怕是“身份”。“七十八十初知天命”，“五四”后八十余年中国文学在“身份”上屡经曲折，其含义大致有两层：一是如何不被政治、经济等属性遮没，而保持文学作为人类通过情感性想象去感悟生命之美的生存方式的独立品格；二是指不要被别种强势文化淹没，而保持自己族裔的、乡土的文学特性，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发出“区域性”的声音，这中间既包含作家个体角色的定位，也有着不同地区文学适得其所的角色定位。而在“天”“地”的“笼罩”中，作家一直徘徊于一种身份的确认和几种身份的适应之间，文学的突破和停滞也始终紧密联系着作家的身份寻求。

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上述“天、地、人”因素的互动过程，它们的相合，才成中华民族文学之大。而从这样的角度进入文学史，以往一些难题就有可能突破。例如，我们也许可能找到超越境内外对峙的意识形态的文学分期。

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

以往将中国现代文学史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依照“五四”运动（1919）、北伐战争失败（1927）、抗日战争爆发等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确定中国现代文学分期的思路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其局限性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止、分期，我们还有很大的学术讨论的空间。如果着眼于上述“天、地、人”因素，那么，“五四”前后、战时八年、战后二十年、20世纪后三十年大致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后的四个时期。“五四”前后开始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根本上说至今尚未完成，但文学转型、分合态势在这四个时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传承和历史转换。同时考虑到近三十年文学一般不宜作“史的撰写”，而作为“当代文学”作历史淘洗性的考察较为适宜，所以，中国

现代文学史大致可以指从“五四”前后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历史。

谈到文学史的分期，所关注的自然是文学的历史特性。然而，正如马克·波斯特在谈及两个时代的划分时所言，“社会理论的作用就是联系主导性的种种形式以及自由的潜在可能，对历史事物，对变化着的事物的确定”，因此，“分期只是一个分析上的而不是总体论上的姿态”，引入一种新的分期，只是“要引起人们”“关注某些革新”，并非要清晰“划定分界线”，因为任何历史分期都不可能把前后两个阶段划分得清清楚楚，相反，“早期状况自然还在延续”，甚至“还占据优势”，只是新的因素已无法去却，而且，“一个历史阶段的强行推出意味着的，可能不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过渡到了另一状态，而是意味着一种复杂化，意味着将一种结构与另一种结构加以叠合，意味着对同一社会空间中的不同原则进行增值处理或多重处理。阶段或时期并非彼此相继而是相互涵盖，并非彼此置换而是相互补充，并非按顺序发生而是同时存在”^①。中国现代文学史要对民族新文学作整体把握，面对着两个层面的差异，一是如果不将台湾、香港，乃至澳门文学纳入民族新文学的视野，那么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是严重残缺的，但中国内地、台湾、香港等不同地区文学的差异是明显的；二是一个地区内各种文学现象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例如，如果认真考察“五四”时期、30年代的中国内地文学，就会发现，在一些文学现象上，30年代仍在做五四时期的课题，而在另一些文学现象上，“五四”时期就已经在探寻30年代文学的一些话题了。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如詹姆逊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构成或历史上现存的社会事实上都包含了几种生产方式的同时交叠和共存，包括现在在结构上已被贬到新的生产方式之内的从属位置的旧的生产方式的痕迹和残存，以及与现在制度不相一致

① [美] 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6页。

但又未生成自己的自治空间的预示倾向。”^① 这种“交叠和共存”的社会构成改变了以往线性演进的社会模式，也必然使各种社会思潮（包括文学思潮）以种种进退纠结、“先”“后”交叠的形态存在。面对差异丰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其分期就更不可清晰“划定分界线”，而是要既找到各个时期“主导性的种种形式”，又敏锐关注“自由的潜在可能”，在两者的“协合”中呈现“新”“旧”之间“叠合”“附生”“共存”“相互涵盖”“相互补充”等丰富状态。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并充分考虑到如果“某一阶段的文学已开创了文学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么这一时期“与本国前一时期的文学”应该“确已产生了足以构成两个历史时期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是反映了历史的前进”而不是“倒退”，“是不可逆转的而不是转瞬即逝”^②，我们可以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五四前后文学”、“战时文学八年”、“战后二十年文学”三部分来作初步考察（“20世纪后三十年文学”也已自成一个发展阶段，只是将它作为“当代文学”来作考察），其分期界限是大致，甚至模糊的，但各个时期的文学转型（转换）、分合态势仍是明显的，而且是尽量将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文学作为一个历史整体来把握的。

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和典律构建

文学史如同文学一样，应该是富有学术个性的叙述。即便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不是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要宏大而不虚泛，也得取决于叙事的个体话语方式。但作为课堂讲授的中国现代文

① 转引自胡亚敏《后现代社会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② 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章培恒、陈思和主编《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4页。

学史，还是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如何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线索。以往文学史线索的把握着重的是时间性历程，这容易进入线性序列的叙事，文学史考察往往在由现代性（或主体性或世界性）构成的单一线条上推移、分割，许多存在于这一时间性链条外的东西就被拒斥了。所以，我们在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线索时，可以把历史注意力适当转到文学史的空间性上来，关注文学的生存空间，关注文学场域中各种资本介入和各种角色扮演的复杂纠结（包括“文学空间的切割、分配与连贯”^①），这样，文学史叙述有可能摆脱某一观念的统摄，而成为对于文学历史的生动叙述。

强调从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结合上来把握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实际上也是希望对“以往文学史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本土性”作出调整，而“为另一种史观——游动的、多重的、跨国的史观——作准备”^②。过去的文学史考察，在“中原心态”的种种影响下，将中华民族新文学史中的许多空间和层面遮蔽了。这种状态应该改变，也正在改变。人在某地，应能观照他地；“离乡之后反而认清了原乡的所在”；迁徙漂泊到异乡，应能发展出对在地文化的深切关怀……这样的文学史视野才能接纳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丰富性。为此，关注文学的生存空间显然是重要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空间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跟地域联系在一起，又由政治体制、语言文化环境、自然风俗人情等互相隔离开来的社会空间，各个地区，尤其是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的社会体制、人文环境、语言格局、外来影响等都有所不同，甚至迥然有异，文学的同中之异，其情味色调质感，决非“设身处地”便能体味；其题旨形象体式，更决非一把批评尺度就能衡量。另一是由文学自身建制提供的生产、消费空间，即有作者和编者（生产者）、读者（消费者）及其公共空间（报刊、出版机构、行

① 黄子平：《香港文学史：从何说起》，《香港文学》2003年1月，第217期。

② 王德威：《〈本土性的纠葛〉序》，《香港文学》2004年3月，第231期。

销市场）组成的文学运行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作者构成（如自由撰稿人、自由职业者或政府机关成员）、编者队伍（自由办刊人、商业性雇员或官方政治审查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在大陆和台港地区更有巨大差异。这样的文学生存空间，是会有多种文学史叙事的“入口”和“路线”的。而“共生、多元、互动”是可以作为整合（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开阔而又差异丰富的空间性的基本线索。

共生是指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跟现代文学千姿百态的现实呈现的关系，而现代文学的丰富形态是指它具有多种“意识范式”^①。如果我们将每一地区作家心目中对本地区文学建构的范式称为“直接范式”，将各地区作家心目中对中国文学传统建构的范式称为“理想范式”，将一个地区的作家群对其他文学建构的范式称为“他视范式”，那么，我们会发现，在理想范式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尺度和一些人类普遍性的走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维持整合性的最根本原因。而直接范式和他视范式间的关系也会使它们成为某种整合力量。众多范式正可以看做具有不同适应能力的变异因子，范式越多越能适应各种不同情况。当某种威胁文学生存的因素变得严重时，某种范式会发挥其特殊的适应能力，甚至使其他范式靠拢、从属它，而使文学“随遇而安”，继续生存发展。

多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生命历程。文学从历史本质上讲就是多元的，而20世纪的中国人一方面共同承受民族命运的变迁，另一方面又生活在有着不同生活变迁的社会空间里，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特征更加明显，而其中文学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多元最为值得关注。文学的现代化绝非一个普遍的统一的进程，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内部也有着种种悖论式的历史真相。过去我们习惯于对文学的现代性采取整体主义认知态度，结

① 按法国李维斯陀的理论，“意识范式”是指被研究的那一个社会的人所“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而建构的“范式”。

果有意无意抹杀了文学的多元格局。民族性的多元格局更值得我们审慎对待。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不仅来自中华文化的多民族构成，也来自其作为现代语种文学的复杂性。由白话表意系统引发的现代意象体系及其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区别于西方语言艺术的民族话语方式，以及繁复多样的方言土语包含的魅力在全球性、西方化的冲击下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的重要内容。不同地区的现代文学，提供了文学民族性的不同侧面，而且互相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

互动不仅指任何一种文学只有受到其他文学的挑战乃至压力，才能促使其完善革故鼎新的内部机制，各种文学构成的撞击几乎是文学体系得以生存的全部活力所在，而且也指不同文学对立面的存在，并非一定是正反、主次、支配和被支配、改造和被改造的两极，而是互动成其大，双方都以对方为“镜子”而认清自己的存在。文学是有社会功能的，而这种社会功能恰恰也要通过文学间的“互动”实现。新历史主义的“协合”理论认为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各种“能量”，作家要通过“协合”（negotiation）将各种“社会能量”变成统一的文本，在审美作用下完成其创作。也就是说，协合是文学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方式，作家以自己的主体性使社会能量发生流动、转化以至于平衡，而这种对社会能量的运作方式主要表现为颠覆（Subversion）与抑制（Containment）两种社会功能的动态关系，颠覆主要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抑制则主要指对颠覆性力量的抑制^①。抑制与颠覆并非简单的转化，而往往是同时发生并不断变化的，“颠覆是对抑制的颠覆，而抑制又是对颠覆的抑制”^②，在对抑制进行颠覆时就可能已受到了抑制。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文学的转型时期，文学间的“互动”往往表现为颠覆和抑制的并存，通过这种方式，文学为社会发展，也为自身发展提供着驱动力和制动力之间的某种

①② 刘萍：《反叛的悖论——新历史主义文学功能论与〈麦田守望者〉》，《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4期。

平衡。如果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并不存在着单一的、具有统一分期的文学实体，那么，不同文学实体之间非连续的互动恰恰是历史的真实存在。

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实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经过长期痛苦的演化而获得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基本把握上，应重视这样五方面的互动关系：一是“横的移植”的世界性和“纵的继承”的民族化之间的互动，二是纯文学和俗文学之间的互动，三是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强调乡土情怀的本土化之间的互动，四是追求崇高的作家良知和文学自身的独立品格之间的互动，五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互动。

处理好上述互动关系，就文学史撰写而言，就是要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峙”因素的整合。雅和俗、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世界性和民族化、社会良知和艺术独立等的对峙往往更多地包含对举（而非纯然对立）的意义，强调的是其文学价值判断的性质、艺术风格、文体种类等方面的区分意义，因此在审美空间上更有分流中的渗透。应该具体考察“对峙”何以并存，这往往是社会转型、变化在文学意义和文学消费上提供了兼容空间，也提供了相应的文化文学资源。而“对峙”的整合，既要关注“对峙”双方各自的自律性机制，也要把握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二是如何强化典律构建。文学经典是任何一种文学史最重要的基石，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刚过去的文学时空，其广泛被承认的“恒态经典”并不多，甚至没有，我们接触到的多是经典累积形成过程中的“初级样本”、“边缘”作家。这些作家、文本，正经历一代代学者的研读、一般读者的文化消费、影视或其他媒介的改编，逐步累积着经典因素。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要抓住那些已较清晰地指向经典地位的作家作品，在一定的价值体系中，予以初步的带有历史定位的呈现。文学史撰写是经典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累积性因素，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应该凸显有学术个性的作品研读。

但文学经典的构建又并非单个文本的逐个确认，而是对整个经典体系的把握。因此，以下思路的展开是必要的。

20 世纪是儒家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时期，应该从世界文化潮流的演变来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产生的外部条件。从“文学经典作为盛行的价值观的对照物”^① 的立场出发，梳理清中国现代文学在外来思潮冲击下，其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之间的递变、冲突，集中于不同的文学价值观间的对照来筛选、确认文学经典的构成。

儒家中国时期，国家权力机构认可的典籍和教育体系中文化传统承认的典籍两者合一的状态使经典单一化，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越来越成为文学民间的行为。这是两者根本的不同点。因此，应较为深入地去考察 20 世纪中国社会世俗化、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如何为经典的多样性创造提供了空间，关注这一过程中“是谁如何维护着何种经典”的问题。“经典包括那些在讨论其他作家作品的文学批评中经常被提及的作家作品。”^② 文学史者、文学批评者、一般读者为什么经常提及这部作品，而不是其他作品，其认知动机显然起着重要作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依靠以往经典提供的知识来展开作品阅读的，可是当既有经典累积传承下来的知识跟人们现时阅读活动所需要的知识，跟非经典文本中的可得知识之间产生巨大差异时，调整、扩展经典（因素）就成为必要了。这实际上反映了“不能满足社会现实和个人需要的经典一方和迎合了这些需要的非经典性文本一方之间”^③ 的矛盾冲突。世俗化、民主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和个人对文学的不同需求必然凸现经典和非经典文本之间的鸿沟，也必然影响到人们，尤其是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对经典的认知动机，他们必须对经典尺度进行调整乃至变革，那些“可得知识”层面丰富的非经典文本的潜在经典价值就会逐步显露出来。因此，把握

①②③ 佛克马、蚊布思合著：《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经典文本和非经典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考察中国社会世俗化、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如何提出经典多样性的需求和某个作家、某部作品在跨越文学史家的经典界限之前必须克服的障碍，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尺度的变化，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定义、典律构建的动态过程中去建构现代文学史是必要的。

中国现代文学黏滞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动和由此关联的文学消费意向、方式等的程度太深，因此，在文学的价值尺度上应适当容纳进文学的超越，这种超越应该表现为作家对文学的殉道精神、对人的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深切关怀、对文学形式繁复性的痴醉探索。同时，文学经典的确认作为一个动态的累积形成过程，应该是前进的，而非滞止，更非倒退。因此，在使作品呈现意义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典律构建时，应该敏感于文学的历史水平线的累积递进方向，这样才有可能避免造成诠释的误区。

文学史典律构建最终还应落实于文学形象的呈现和阐释。文学史的叙述应该是诗意的叙述，因此应该着力去发现并“描述”最具有人生观照的复杂性和审美传达的丰富性的形象（体系），凸显汉语在文学形象表现中的独特力量。在文学史一般的撰述中，“历史”的重要性往往会超越“文学”本身的重要性。但是，“语言”事件不应简化成现实事件，文学的研究也不应是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的案例。以思潮的脉络来梳理文学的演变，也要防止落入“诗的存在是为了佐证理论的存在”^①的陷阱，尤其对于用于教学的文学史而言，回到语言、文学的本身，把对人生的感受同对文字的感觉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才是重要的。学生时代如果能多一些文学的、美学的生命感，一生也会有更自觉的生命安排。文学史的教和学，其个性主要都在于用自己的生命感受、艺术感受去传承文学作品，这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尤为重要。中国现代文学史最终做的，也许就是多留给后世几部好作品。

^① 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自序》，台湾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目 录

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念(代前言)	(1)
-------------------------	-----

上编 (1917—1937.7)

第一章 早期新文学	(3)
-----------------	-----

第一节 新文学的产生	(3)
------------------	-----

○蓄势:晚清民初的文学变革 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文学变革的思想资源 “三界革命”主张及其影响 语文学新思路的展开 域外作品翻译的兴盛 ○大众传媒影响下文学建制的变化 近代报业的发展 稿酬制度的建立 职业撰稿人、自由办刊人队伍的形成 ○文学革命的过程 语言变革包含的思想革命 文化守成主义对新文学观念、思路调整的影响 周作人等的文学主张 ○“五四”文学革命精神及其历史评价

第二节 早期新诗	(20)
----------------	------

○胡适新诗的主张和实践 ○新诗和古典诗语的沟通 ○小诗派的形成 ○冰心的诗 ○宗白华的诗 ○湖畔诗人的情诗 ○新诗产生的意义

第三节 “为人生”的小说创作	(29)
----------------------	------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取向 ○从问题小说到人生写实小说 ○冰心、王统照的小说 ○许地山的小说创作 ○叶圣陶的小说 ○许钦文和台静农 ○王鲁彦的小说创作

第四节 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的创作	(39)
----------------------------	------

○创造社 浪漫精神高扬下的变异 ○郭沫若的诗 诗歌美学观的变化 “泛神论”的诗化和《女神》的时代性 两种想象力的驰骋 自由体诗的创造 ○郁达夫的小说 “自叙传”的创作观念 自伤自悼中的艺术升华 青年失败者的形象 独异的叙事风格

第五节 李金发和象征诗派	(49)
--------------------	------